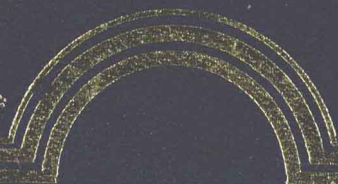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

著 英中成

哲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

——「統傳」與「代現」的性理結合

成中英著



滄海叢刊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 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
——「傳統」與「現代」理性的結合

著者 成中英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再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

編號 E 11005①

基本定價 肆元貳角貳分

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

編號 E 11005①

東大圖書公司

ISBN 957-19-0248-9 (精裝)

前言

前

言

— / —

一九八三年春季，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教授，從事中國現代化思想的哲學基礎研究。我的主題是探索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如何理性的結合，以及此一結合的典範為何。我認定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提供了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理性結合的一個理想模式，也提供了一個有關中國現代化方法形式與實質內容上的典範。從這一個新的角度來考察三民主義思想，我認為不但可以打破三民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約束，還原出三民主義思想的歷史和哲學意義，也可以更進一步，同時也是更深一層分析和了解中國現代化面臨的價值目標與方法手段的認知、評估與抉擇問題。我在半年內寫成「論現代與傳統的理性的結合：三民主義的中西哲學基礎」專文，曾發表為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第十五種。我於該篇論文印出後發現，其中有許多錯簡及漏失的地方，很想有機會加以訂正。我也想更積極的發揮中國現代化思考的哲學意義，在中西哲學與中西文化的結合以及中國哲學的落實應用等幾個重要關節上，提出系統的意

見。本書大致實現了我的這兩個願望。

本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分析的拓展了作為現代化思考的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意義，可視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學與方法學部份。第二部份分析的拓展了實行現代化過程中制度化與策略化問題。這些問題歸納凝聚為管理與倫理、策略與技術的哲學考察，此可視為中國現代化的管理學與倫理學部份。中山先生提供了一個理性的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化的理想模式，但如何落實此一模式於實際，如何從實際的西方經驗與世界經驗領取教訓，如何有效的吸取知識以及有效的應用知識，促使此一模式更為精密、更為充實，同時使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的結合更為機動、更具成效，乃是本書的重點所在。

中國現代化將是一個多參數、多向度、多層面、多階段的輻射、回饋與發展過程，需要不斷的批評，不斷的分析，不斷的整合和不斷的把握。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將提供這種批評、分析、整合與把握，並將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輻射的重要一環。

本書第二部份中的「建立中國管理哲學」，曾發表於中國時報與中國論壇雜誌。「中國工業化與倫理化的雙管齊下」(原名「論工業化與倫理化」)，曾發表於中國時報。「企業倫理的分析」(原名「談企業倫理」)，曾發表於中國論壇雜誌。「策略的哲學基礎分析」(原名「戰略的哲學分析」)與「整體定位、應變創新的思考」(原名「整體定位、應變創新」)，則分別發表於中華戰略學刊與實踐月刊。

代序：論知識份子與中國現代化的目標

——發揮理性、知識、良知、與責任的力量，
達致民主、法治、富強和統一的目標——

爲了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富強而又統一的現代化中國，中國的知識份子必須發揮理性、知識、良知和責任的力量，向中國的民主、法治、富強與統一的目標奮進。這無疑將是一項十分艱鉅的工程，也將是一個曲折多難的過程。但這卻是一項浩大無比的歷史挑戰，也應是一項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爲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面臨到這項挑戰？爲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肩負這項使命？我發自內心的回答是：不做中國的知識份子則已，作了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就難辭這份使命；不體認中國的歷史則已，體認了中國的歷史就不得不面對這項挑戰。

也許，有人認爲可以選擇不做中國的知識份子，甚至有人認爲自己事實上就非中國的知識份子，因之也就不必面對中國歷史，妄言肩負使命。但即使就一個西方的或非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如果稍具世界眼光，略有歷史智慧，他也不得不承認人類追求和平與幸福的理想實已包含了

東西方民族國家的平等互惠和攜手並進；而中國人能做的貢獻在東西方民族國家的交互影響中實佔據極重大的地位。這是世界地緣政治所啟示的訊息，也是中國歷史文化所表露的意願。因之，任何一個深沉的知識份子——一個對世界體系和歷史潮流有所認識、對人類前途有所關心的知識份子，都無法否認中國能夠維護世界和平的潛力以及中國文化能夠促進世界大同的影響。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民族國家固然一方面仍處於一個自然競爭的狀態，但另一方面也逐漸憬悟到相互依存的經濟與安全關係的重要。中國成爲一個民主、法治、富強而又統一的國家，中國文化發揮其內含的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將是一件對世界和平的維護和人類精神生活品質的提升極有助益的事。相反的，一個貧窮、極權和分裂的中國則不但將是中國內部動盪之源，亦將是世界秩序混亂之所由了^①。

什麼是知識份子？什麼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爲什麼中國必須走向民主、法治、富強和統一？爲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有責任去追求中國的民主、法治、富強和統一？這些都是咄咄逼人的根本問題。在本文中我只能就我思想所及簡單的加以闡發。

① 目前美蘇冷戰有了極大的解凍，是否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事實上，世界和平絕不是美蘇兩國消除核子武器就可以完全解決的。美蘇兩國有摧毀地球的核子武力。兩國的對抗也提高了世界遭受毀滅的機會。但美蘇和談雖然使世界安全得到相對的保障，世界積極性的及整面性的和平却仍有待東西文化中的民族國家來共同維持。

知識份子是一個現代名詞，是與英文的 intellectual/intelligentia 相應的一個名詞。英文中的 intellectual 一詞指有智能且掌握知識的人。在西方文化及學術傳統中，有智能且掌握知識的人雖非一定掌握政治權力或擁有財富，但卻常為掌握政治權力及擁有財富者所用。在古代希臘與羅馬，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 是詩人、悲喜劇作家、哲學家，甚至是立法者。他們對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蘇格拉底即因提倡「自知無知」的理性哲學而遭受迫害。在中世紀，知識份子成為神學僧侶，基於對上帝啟示的信仰，掌握了引導社會、教化社會的實權。文藝復興之際，古典哲學復興，知識份子反而扮演了反對宗教權威的角色。他們在古典哲學的激勵下，重新肯定人文世界，追求人文真理，並開拓了新的知識園地，導使西方科學萌芽。他們運用人文和自然理性創造了新宇宙觀、新人生觀，以及新倫理學，強烈的衝擊了傳統的神學。但他們也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甚至犧牲生命。伽利略 (Galileo) 為他的太陽中心說遭受審判，斯賓諾沙 (Spinoza) 為他的倫理學被逐出教會，普魯諾 (Bruno) 則為他的汎生哲學被活活燒死。從這些例子來看，傳統西方的知識份子在西方歷史中堅強的樹立了抗拒權威、追求知識與真理的道德楷模和知識傳統。

自宗教革命以後，西方社會逐步趨向功能的理性化，知識份子也逐漸取得了受到俗世權威保護的社會地位，成為西方發展知識、開拓資源的主力軍。這是西方現代理性主義的開端，也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先導。在啟蒙運動中，典型的西方知識份子已擺脫了神學權威的束縛，開始積

極的追求一個理想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為個體的人在宇宙自然及社會國家中的地位作新的界定。這是不去發展整套的知識理論作論爭武器不為功的。為了反權威，也為了迎合社會發展的潮流，更為了創造一個理想社會，十八世紀的歐洲知識份子發揮了巨大的啟蒙功能。他們在古典哲學的理性傳統上，重新塑造了現代的理性傳統。從道德意識之說到私有財產之論，從民主思想到功利主義，清楚的刻劃出現代西方的國家意識、社會意識以及個人意識。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造成資本主義的勃興^②，也帶來歐洲社會貧富的懸殊，更導向達爾文物競天擇論，馬克斯階級鬥爭說的發展。我們不必否認馬克斯是一個知識份子。他的階級鬥爭說和共產主義思想透過他實際的政治活動無疑的造成了西方理性化社會和理性知識傳統的分裂。他的學說更透過俄國革命直接的影響了現代中國的命運^③。顯然，一個學說的影響是浩大的：一個好的學說能夠帶來人類的福利，一個壞的學說卻能製造人類莫大的災害。西方古典知識傳統雖遭受馬克斯主義的嚴厲批評，但却仍能保存發展迄今。系統化的理性哲學和經驗主義仍是今天西方社

② 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 (Max Weber) 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基督教新教 (清教) 倫理之所賜。但此處吾人也要指出近代歐洲知識份子 (並非一定為清教徒) 的理性主義與知識追求也是促使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項主要因素。

③ 中共政權早期顯然以馬列主義為其立國的最高原則。最近趙紫陽指出中國尚屬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則早期共產政權所採行的共產政策都應該被看成是認知與判斷錯誤之結果。

會的精神支柱。理性與經驗的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更成為西方知識傳統與知識份子思考的特質。

從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知識份子逐漸走上專業化的道路，這是由於知識透過科學的發展已逐漸成為分門別類的專業活動。知識成了牟利的商品和企業的工具，知識份子也就成為商業組織和政府組織中的僱員。知識往往轉化為技術，喪失了批評權威、展現價值的能力。知識份子也就淪落為社會的附庸，喪失了啟蒙社會、改革社會的魄力。知識份子作為教授、學者、教育家與作家似乎與社會逐漸隔閡疏離，甚至被看做是不切實際的「蛋頭」(egghead)。現代西方社會結構的僵化與西方知識份子的中立化都是極其可悲的現象。如何把知識與人生與社會的基本價值結合起來，重振理想主義與道德勇氣，來面對人類社會的危機與人類歷史的蛻變，乃是目前西方知識傳統與知識份子面臨的最大問題。

總結西方知識傳統的討論，我們不能不承認此一傳統是西方社會進步和進化的推動力。在此一傳統下的西方知識份子也發揮了塑造西方現代社會與國家的潛力。西方知識傳統的特徵是理性主義：用理性來界定真理，用真理來釐訂制度、批評現實、解決問題。此一理性主義也導至了現代科技的發展，為現代西方社會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一套求知方法與一套知識標準。在這個知識傳統的發展中，知識份子突破了傳統權威，樹立了以理性與知識為核心的現代化世界。西方的知識傳統是強大的。西方的知識份子也擁有強大的知識良心，在「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信條下創造了輝煌的成果。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可說都來自此一知識傳統的傳播

與知識份子的創造。二十世紀的西方知識傳統和知識份子不幸染上專業化、狹隘化以及僵硬化的疾病，顯示其內在的理性智慧與知識活力已逐漸喪失。如何重振理性和道德，進行知識的整合與批評以克服危機、發展生機，正是西方知識份子面臨的最大挑戰。

反觀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知識傳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知識份子在不同時期也處於不同的地位，並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知識傳統在東周孔子以前並未與政府的權力體系分開。這是所謂政、學不分時期。孔子是第一個把知識傳統（暫名之為「學統」）獨立起來^④，不但成為民間授學的創始人，也成為知識份子基於理想以謀求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

孔子以前政統與學統雖未分開，但並不意謂學統與政統沒有區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後又還政於成王，顯然在周公眼中掌握政權是一回事，推行人文教化卻是另一回事。尚書中天命之說已將天道與人道分開。人道包含了為政之道以及為人處世之道。但無論為政之道或為人處世之道都已假設了一個可依循的實體準則。此一準則早期為天命，後期則演化為內在於人的人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天命與人性，外在的道和內在的德已合而為一。

④ 孔子重「學」以致「道」，故論語有言「君子學以致其道」。孔子要從「學」中建立了「道」。老子重「道」以去「學」，故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他要以「道」代替「學」。儒家與道家，孰先孰後，若從「學」與「道」的歷史發展來看，應是先有「學」才有「道」。若從「學」與「道」的邏輯關係來看，則應是先有「道」方有「學」。很顯然，儒家是承繼傳統的，而道家則是叛離傳統的。

以上所舉中庸中的儒家哲學命題經過反省體驗逐漸發展爲一套完整的價值體系：包含了生生不息的本體哲學，民胞物與的仁愛情操，禮樂教化的社會道德，天人合一的修養功夫，以及天下爲公的大同思想。這也就凝聚成爲一套完整的「道」的體系和傳統，可簡稱之爲「道統」。所謂「道統」就是儒家對「道」的體認和認知的傳承。自孔子而孟子，不但儒家哲學已建立了一個「道統」，古代的經典經過儒家的整理與詮釋，也成爲民間授學的內容。故儒家的「道統」又再以「學統」的方式出現。迨及「漢武帝」不但儒家的「道統」被定爲一尊，儒家的「學統」且發展成爲普及官學的古今文學派之爭了^⑤。

基於儒學定於一尊之後的影響，如果我們把儒學看成是中國的知識傳統，應是說得通的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能夠比較清楚的說明中國知識傳統與中國知識份子的特色。首先可以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中包含的知識傳統顯然強大於其包含的反知識傳統。中國歷史中當然有反智的現象，如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鄙視當時的儒生，都可引爲反智的例證。但李斯用韓非之學，高祖用商山四皓之才，還是顯出對知識傳統及知識份子的倚重。其次要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中以儒

⑤ 除儒家外，其他諸子百家是否也有其哲學的傳承及典籍的學統就很難言了。墨學與楊學在孟子時代曾爲顯學，但後繼者却渺無一人。法家在漢代雖有酷吏採行，但也僅爲術的應用而非學的提倡了。值得探求的倒是老莊之學是否有其民間的傳承。至少老莊之學在魏晉時代發展成爲三玄中的二玄，顯示道家是有其歷史發展的統緒與脈絡的。

家爲代表的知識傳統並未能真正發揮其原初的活力，也未能實現其原初意含的理想。自漢以後，以孔孟爲代表的知識份子典型（士君子或士大夫）可說是難得一現。兩漢儒學雖有可觀，但真正影響政治、轉移風氣的大儒又有幾人^⑥？也許在此一了解下，我們應嚴格分辨儒家或中國知識傳統中的「道統」的傳承與「學統」的傳承。「道統」的傳承是指堅持哲學主張以求改革政治與轉移社會的活動；而「學統」的傳承則只是研究學術以爲時用。在後一意義下的知識份子往往附合權勢，用其學術爲帝王效犬馬之勞。這是把儒家知識傳統中的「道統」淪喪殆盡了。

魏晉玄學興起，佛學輸入，至唐代而大盛。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大都雜揉道佛於儒學之中。從原初的儒家知識傳統來看，儒家的「道統」固然早已不存，就是儒家的「學統」也若斷若續了。

真正繼承及發揮儒家知識傳統的「道」與「學」的精神者應推宋明的儒者。宋明儒對國家的危機、社會的危機、思想的危機，可說受到極大的刺激。透過深入古典儒家經典之學的啟示，自然引發了續亡繼絕，恢復道統的雄心大志。張載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就是此一道統心態最好的寫照。但宋明儒雖有大志，並立學術思想上開拓了高遠的境界，但他們仍無法以其理想的儒家道德來規範與改革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朱子爲官雖有小成，陽明平反雖建大功，但卻無當於當時政治和社會的起衰振敝。朱王都是儒家知識傳統中

⑥ 董仲舒有經世之學，王充有批評之能，都是漢代難能可貴的知識份子了。

「道」與「學」的發揚者——但他們影響於後世者的似乎仍只限於其學術思想而已。

真正體現了儒家知識傳統中的「道統」精神的知識份子應是明清之際的四大大家：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和顏元。他們身負亡國之痛，抱着仁心和氣節，堅不與入侵的滿清妥協。他們也未放棄知識學問的追求，並在知識學問的追求中深切檢討中國歷史上政治社會制度的得失，從而對人心、良知與道德實踐有更深切的體會。黃宗羲尤能揭示中國傳統君主專制的毒害，從各種角度來批判這個流傳兩千年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可說開創了理性系統批評政治制度的學風。雖然他本人的復國運動並不成功，但他的勇氣和言行卻於後代的仁人志士發生莫大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儒家知識傳統內在的理性化的一大推進^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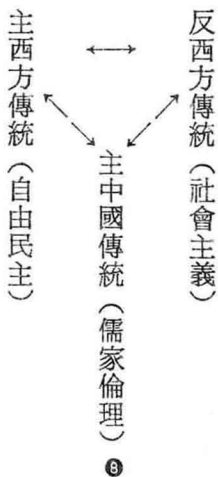
清中葉以後，政治上的閉關政策逐漸為西方強權打破，而中國也面臨了千古奇變。在堅兵利炮下，中國喪地辱權，陷入半殖民地的悲慘局面而不自知。對此一處境深刻的認識並發出警號者首推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不但有敏銳的國家民族的危機意識，他並能激發強烈的憂民憂國之心，放棄現實的安頓，而倡導並獻身於為民族求生存、為國家保獨立、為社會謀福利的國民革命。他參考了中西學術，殫思竭慮提出解救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根本之道。中山先生的這等眼光、這種抱負、這項勇氣、這番胸襟，可說具備了多重劃時代的意義。他不但是現代中國

^⑦ 請參考拙文「論黃宗羲的理性思考：理學與心學所批評的反思」，收入一九八七年杭州出版的「黃宗羲論集」中（頁八——四五）。

的開創者，也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創始人，更是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理想典型的塑造者。

中山先生具備西方知識傳統的優點，他看重知識與理性，並敏於批評思考。但他也保存了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知識傳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有深切的體驗。他之倡導革命並獻身革命也可說是中國知識傳統中的道統精神的一個高度表現。換言之，他不但看重知識與理性，且能基於良知和責任發為實踐的行為。因之，中山先生所塑造的知識份子典型是結合中西兩項知識傳統的：不但具備了現代性，而且充滿了前瞻性，自然更為中國傳統的知識傳統帶來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智慧。

不幸的是，中山先生結合中西學術的知識理想在二十年代的中國並未獲得普遍的支持，當時也未為其後繼者貫徹實現，用以解決中國面臨到的諸般問題。因而五四運動產生了主張西方知識傳統的全盤西化的觀點，也導致了反對西方知識傳統的馬克斯主義思想。在現代中國形成了三重兩極化的對立：西化（西方知識傳統）與中國本位文化（中國知識傳統）的對立；傳統西方（自由民主）與反傳統西方（社會主義）的對立；反傳統西方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立。可用下圖表示。



這三重兩極化的對立造成了現代中國知識界的混亂、無序、失向、複雜與糾纏，也造成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在學術上、在政治立場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種種疑懼、種種徘徊以及種種矛盾。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被要求為時代的先知先覺，另一方面又被政治勢力利用為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方面被要求為文化價值的傳承與傳授者，另一面又因其卓犖不羣遭受慘烈的迫害。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角色自我認定也是混亂與模糊的：是繼承傳統？或是打破傳統？是主西化？或是反西化？是向右？或是向左？是反右還是反左？從五四到中國大陸文革六十年間，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所遭受的痛苦和迫害何止於顛沛流離！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所面臨的處境又何止是迷失徬徨！

總結以上吾人對中國知識傳統變革的認識，我們可以歸納中國知識份子為兩大典型：一是以儒家哲學為核心的知識份子典型；一是以中國現代化運動為核心的知識份子典型。儒家心態的知

⑧ 西方知識傳統所包含的不是單純的價值：不同的價值不但相互矛盾，每一個價值又有正負兩值。如自由、民主有正面的價值，但在一定的條件下又有負面的作用（如個人主義，暴民政治）。科技與現代主義作為兩項價值，又何嘗不然？至於自由、民主、與平等，社會正義等價值相互間的衝擊矛盾，也是現代政治經濟學不能不慎重討論的問題。資本主義作為一項價值，更是十九世紀以來爭論最多的問題。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既看出西方價值之所長，但又不能否認西方文化加於中國之害。對於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心情也同樣複雜矛盾：既不能無見於中國傳統阻礙進步的包袱性，又不能不依托中國文化傳統以為起點與支柱。

識份子典型雖有其持久的歷史與理想意義，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却喪失其理想的規範性而淪入空疏，甚至還產生負面的影響。在另一方面，現代化心態的知識份子典型（不論是偏右或偏左）雖為中國現代化的中堅，但卻未能團結凝聚，內化為堅強的理性力量。相反的，它卻在時代與世局的外力下，趨向極端與陷入膚淺，為中國的現代化帶來重重困境與種種危機。因之，如何尋求一個兼顧傳統與時代的、綜合東方與西方的，兼能接受西方之長與批判西方之短的，兼為整合一致而又收放自如的新知識份子典型仍是中國現代化與現代化中國所面臨到的最大難題。我說尋求，毋寧應說建造，因為並沒有一個已經存在的模型等待發現。

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對已經歷盡從傳統到現代的滄桑變革，負創累累、血跡斑斑，是否已漸漸覺悟出應具的型態，是否已確定其應負的使命、應處的地位，仍是一串難以確切回答的問題。明顯的，省思中國現代史痛苦的經歷，省思知識份子角色所犯的錯誤、所走的歧路，並盱衡時代與世界的大局，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否已獲得一份特殊的智慧，是否已達到一個成熟的深度，是否能夠異口同聲的指出中國未來的何去何從，中國知識份子的取捨定奪，這些也是有待當前中國知識份子揭曉的問題。今日中國大陸上的學者重新探索中西文化之爭，把五四時期未能解決的問題重新提出，但這絕不應是五四時期的翻版，而應是含攝了五四的教訓、文革的教訓的新考察、新觀照。一個新的理性的啟蒙運動是必要的，一個重塑知識傳統的造山運動是必要的。已有一羣歷經艱辛、不畏威權的知識份子能夠肯定自我、肯定真理、肯定良